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评介

山东人民出版社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大师经典

1969～2003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评介

张杰 殷玉平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经典: 1969 ~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评介/张杰, 殷玉平编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4

ISBN 7—209—03447—1

I. 大... II. ①张... ②殷... III. 诺贝尔奖金—科学家—经济理论—评论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23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 //www. sd - book. com. cn](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3. 875 印张 2 插页 39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25. 00 元

前 言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设立之初,只设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等5个奖项,并未设立经济学奖。也许,在诺贝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经济学的社会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然而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学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比其他任何一个科学逊色”。正因如此,为了弥补诺贝尔遗嘱中的缺憾,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之际,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并经瑞典皇家社科院批准,由瑞典中央银行出巨资设立了“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该奖原本有别于其他5项诺贝尔奖,但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交由诺贝尔基金会委员会负责管理,并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和颁发,授奖原则、奖金额度及评选与颁发程序都与其他诺贝尔奖项完全相同,故人们习惯地视其为正式的“诺贝尔奖”。从1969年到2003年共有53位经济学家获得此奖。

在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类愈来愈需要经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和模型。可以说,经济思想观念对人们经济行为影响的威力是无比巨大的。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象的有力得多。说实话,这个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人在实际生活中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会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握权力凭空臆测的狂人,也只不过是多年以前一些不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基础经济理论,而且更注重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实际应用,许多更是偏重于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成果。与其他学科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时间要比成果完成时间晚得多,其理论成果可以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现代经



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他们的思想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塑造了人们的现代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研究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尽管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不幸的是,由于我国特殊时代的政治原因,现代经济学成了批判的对象,虽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加大了学习和借鉴的力度,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学的知识知之甚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知之更少。况且诺贝尔经济学奖涉及的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专业性又非常强,运用了大量数学工具,有时经济学家也难以完全搞明白,非专业人士更是如读天书。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研究,都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想,普通大众更需要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知识,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评介》一书,以每一位获奖者为对象,各写一章,力求以比较通俗易懂的笔墨,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地反映截止到2003年每一位获奖经济学家的基本面貌,希望通过对他们所思所想的介绍来展现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和智见,为大家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为进一步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提供一点有益的帮助。

目 录

前 言.....	(1)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丁伯根	(1)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弗里希	(11)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萨缪尔逊	(17)
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库兹涅茨	(28)
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希克斯	(37)
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 罗	(48)
197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里昂惕夫	(55)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缪尔达尔	(67)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哈耶克	(80)
197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康托罗维奇	(88)
197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库普曼斯	(96)
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弗里德曼	(106)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俄 林	(114)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米 德	(121)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西 蒙	(128)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舒尔茨	(136)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刘易斯	(145)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莱因	(153)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 宾	(163)
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勒	(172)
198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德布鲁	(179)
198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 通	(188)
198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莫迪利阿尼	(200)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布坎南	(210)
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索 洛	(217)



198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 莱	(225)
198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哈维默	(236)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马克维茨	(242)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夏 普	(247)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米 勒	(254)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科 斯	(260)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贝克尔	(270)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诺思	(284)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福格尔	(290)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纳 什	(296)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豪尔绍尼	(303)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泽尔滕	(308)
199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卢卡斯	(313)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维克里	(325)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米尔利斯	(332)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科尔斯	(340)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默 顿	(346)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马蒂亚·森	(350)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芒德尔	(362)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麦克法登	(371)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赫克曼	(376)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克洛夫	(385)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彭斯	(394)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利茨	(402)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史密斯	(410)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卡尼曼	(418)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格兰杰	(426)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恩格尔	(432)
参考文献		(437)
后 记		(439)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丁伯根(1903 ~ 1994)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 荷兰人, 190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22年至1926年, 丁伯根在荷兰莱登大学学习物理学, 1929年以一篇论述物理学和经济学中极值问题的论文而获取物理学博士学位。然后, 他在荷兰中央统计局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研究单位工作, 并在那里留任到1945年, 1936~1938年, 他作为专家在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工作。1931年, 他也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兼



职统计学教师, 1933年成为设在鹿特丹的荷兰经济学院(现名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兼职教授。1945~1955年, 丁伯根担任荷兰政府中央计划局局长。1955年, 丁伯根离开了中央计划局, 成为荷兰经济学院的一名专职发展计划学科的教授; 此后, 他把他的活动集中在第三世界的问题上。他先后担任过印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府顾问以及欧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的顾问, 1966年至1974年, 他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席, 并不知疲倦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和讲学, 说服他人相信需要一项旨在缩小穷国与富国间差距的雄心勃勃的国际发展政策。

丁伯根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创建或参与了现代动态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验宏观经济学、发展计划的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和理论。丁伯根的主要著作有:《商业循环理论的统



计检验》(1939年)、《1921~1933年美国的经济周期》(1939年)、《经济计量学》(1959年)、《经济政策论》(1952年)、《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1954年)、《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1956年)、《1870~1914年英国的经济周期》(1956年)、《论文选集》(1959年)、《改造世界经济》(1962年)、《经济增长数字模型》(与博斯合著,1962年)、《国际经济一体化》(1965年)、《发展计划》(1968年)、《收入分配》(1975年)等。1969年,他与弗里希一道因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借助于发展成熟的理论和统计分析来创造经济政策和计划的合理基础的贡献,涉及重大科学突破”,而丁伯根“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之后,他还曾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一、经济计量学模型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学),都只注重对经济现象中“质”的方面的研究。它们往往只通过揭示各种法则和一般性的经济规律,来告诉人们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然而却无法肯定这种变化将会达到的“程度”。这是定性研究的一个局限,经济学也因此被称为“空盒子”,这种缺乏实际内容的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面前十分被动,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与此同时,建立在广泛收集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统计学也始终只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整理归纳上。统计固然可以记录事物的演变,显示出经济波动的轨迹,但却不能对造成种种变化的内在原因提出解释。丁伯根认为,应改造旧的研究方式,把两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把经济分析的基础放在统计数据提供的信息上。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认为首先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改造现有的统计体系,使之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经济概念进行数据测度;二是要有一套从离散的统计数据中抽象出其中内在规律的方法。数理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模拟检测手段、方法,使实现上述设想成为可能。它提供的数学模型,最终促成了“一种对理论概念进行统计测度”的新经济学的崛起,这就是经济计量学。1930年,丁伯根与弗里希、费

雪等著名经济学者在美国成立了经济计量学会,作为“促进与统计学、数学相联系的经济理论”的国际组织,并且从 1933 年开始定期出版《经济计量学》杂志来推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

丁伯根指出,建立计量模型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1. 首先要确定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关系应选用什么样的数理形式来予以表现;每个函数或方程式中各包含哪些基本变量;时间因素的滞后效应该怎么定;函数关系中变量的选择与简化、淘汰应遵循怎样的原则,等等。总之,首先要确定计量模型的抽象形式。数理经济学的特点就在于能够把经济理论表述为抽象的数学表达式,这就为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理论模式与依据。

2. 然后,再把由数理经济学提供的抽象数学式中各个系数和参数具体化。也就是说,通过把统计数据所含的有关信息输入到抽象模型中去,使各个参数变为具体的数字。所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有效的模拟技术。常用的模拟技术有数据分析和回归分析。

3. 模型建立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统计检验,以便证明这些模型不但与经济理论相一致,而且统计数据与经济理论之间也具有 consistency。只有通过统计检验的模型,才有一定的可信度。常用的检验方法有:相关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等。

此外,如果处理的对象是一个复杂体系的话,还必须采用方程组来描述多经济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整体关系。丁伯根于 1936 年创建了一个荷兰经济模型,当时他创立了一个具有 24 个方程式的方程组。丁伯根相信,联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手段。

丁伯根创建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相一致的收入形成和消费支出方程式。模型中的消费是一个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将货币流量分为价格和数量,并将滞后计入一些方程式中。这个早期模型还显示了工资性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个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经菲利普斯曲线描绘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丁伯根在评价这个早期及后来的模型时曾经非常谨慎地指出,它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从实质上说,并不是纯新古典主义的。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际联盟要求丁伯根创建当时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验验证方法。当时,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有很多解释,但是,对这些解释加以全面论证的可靠方法,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丁伯根于1939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此书共分二册。在第一册中,集中检验投资活动理论,丁伯根阐述了经验方法并提供了它的应用实例。丁伯根的分析应用了标准的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也应用已有方法去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第二册的基本意图,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从而说明美国经济的经济周期。它包括有48个方程式的一个方程组,构成了应用于美国经济的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接着,他又为法国、英国和德国设计经济模型,以解释这些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预测该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丁伯根不是着眼于每个单一的经济阶段,而是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动态模型,把通行的统计方法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即经验宏观经济学。

经济计量模型在经济分析和研究中的成功应用,使丁伯根能够断言:如果我们用语言文字来处理经济问题,那么,它只能限于在每一经济关系中只含一个自变量的情况,而无法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变化因素的复杂关系。计量模型则不同,它在处理离散状态的经济现象时,具有自己“化零为整”的优越性。这样,就确立了经济计量学在经济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丁伯根在1959年出版的《经济计量学》也许是系统地介绍计量经济学的第一本著作。人们不会忘记丁伯根这本著作的启蒙作用。计量经济学家也会有错误,数学工具的使用也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它却至少有助于人们减少因拙劣的决策而造成的愚蠢结果,为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带来了帮助。

在经济计量学领域中,丁伯根对于动态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利用统计学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尝试,尤为人所乐道。他是最早应用不同方程式进行动态分析的,这个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末成为一种

分析模式。丁伯根还因创建了说明单个市场周期的“蛛网理论”而受到赞誉。这个理论阐述了价格和产量的短期波动,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他认为,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有一年的滞后期,而需求的反应则是即时的。更广为人知的是,丁伯根最早创立了经济计量学模型,它保证了可靠的短期经济预测,并导致多种合理政策的选择,奠定了他的经济计量学理论重要创始人的地位。

二、经济政策分析

1945年,丁伯根担任了新成立的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经济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论问题。

为了系统地论述经济政策问题,丁伯根将政策变量划分为三类,即目标、数据和工具。他认为,只有工具变量至少与目标变量相等时,政策才会变得富有效率。例如,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率是惟一的政策工具变量,那么,将要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调整到合适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成为进行全部政策分析的基本前提,但在当时,政策目标通常是被分开来考虑的。丁伯根把经济政策看做是由许多相关的政策目标组成的,而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足够数量的政策手段。这是丁伯根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在此领域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丁伯根在探讨政策问题时,一开始引入了一种由一定的经济变量和相同变量的结构方程所描述的特定经济。如果经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数量相等,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制订政策来实现目标。后来,丁伯根介绍了一些灵活的目标,也就是他所关注的实际收入最大化与失业最低化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实现某个特定失业水平的目标。

丁伯根不是把经济政策看做是一个政策制订者享受绝对决策权力的状况,而是强调了更为复杂化的分散政策制定的状况。他考察了与分散决策相比,在特殊情况下集中决策的优缺点。在分散决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误解是,决策者往往受到其他决策人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类似在寡头状况下的决策方式。



丁伯根明确指出了分析问题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分析问题上,政策手段是既定的,经济变量(例如,收入、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有关模型,而政策研究则相反。丁伯根发展了一种“决策模型”,该模型不是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些政策并对其结果加以预测,而是把一些目标(例如,为社会接受失业与通货膨胀水平)作为既定的,并推导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优政策。

丁伯根还发展了一个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数量框架,并由此提出,最优方式是政策制定分散化与集中化的混合,从原则上讲,分散化是最优的,但是,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又要求更多一些的集中决策。丁伯根对缺少超国家决策机构尤为关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这样的机构是必要的。

丁伯根的目的在于,用数学表示经济政策决策中的各种问题。他强调经济观点的数学化具有精确性。但是,他又谨慎地说明,这些经济观点不可能独立于学术、法律、技术和心理因素之外。丁伯根的政策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福利经济学,而是直接涉及到实际经济中的实际政策。他积极发展能够迅速地用于推进当前经济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的理论。

他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论述在实践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的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全部著作主要是采用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丁伯根在他的著作中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他经历中的两个方面,即在中央计划局的工作以及与朋友们对经济政策多方面的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都得到了荷兰工党的认可。他的基本目标是将经常处于肤浅、盲目方式的争论引导到客观、科学的分析中去。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

50年代中期,丁伯根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问题,以及国际合作与一体化问题上。他对贫困国家的问题具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也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比、荷、卢经济联盟的成立所激励。丁伯根在发展领域的成就,是他对人道主义活动的贡献和他的人

类理想主义的观点的自然结果。他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修补因殖民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不幸。

1955年,丁伯根辞去中央计划局的职务,在荷兰经济学院任发展计划学科教授。他开始就发展问题进行广泛的写作,同时还担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顾问。自1966年至1972年,他担任了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关于独立发展问题的专家顾问团体。丁伯根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中,决心要为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而工作。

增进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丁伯根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在1954年的著作《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丁伯根论证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是自主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他将政策建议与经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他总是认真地提醒读者。丁伯根建议国际合作应该更加计划化,并看到每个国家对短期利益的重视而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主张减少进口限制、统一间接税、自由兑换货币等政策。这些措施将使其他的政策手段更为分散化。丁伯根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纯理论讨论并不满意,他极力主张,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要多搞一些定量分析。

除了对国家之间关系给予关注以外,丁伯根还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发展作出了广泛的努力。丁伯根的发展模型是利用这样的假定而设计的,即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的数据可以利用,计划者、管理者和从事发展计划的政治家们的技能是有限的。他设计了三种主要的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三个计划阶段上的简单宏观模型。第一阶段,即宏观阶段,经济变量的总水平被作为目标,对全国的产量、储蓄、投资、资本和进出口规模制订计划。在第二阶段,经济将根据地理区域和产业或部门进行分类,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部门资本产出系数,总体活动水平将在各部门之间加以分摊。最后,在计划的微观阶段,对单个项目进行评价和规划。

相反,丁伯根所设计的第二类模型是以单个项目为出发点,制订了一个由许多微观计划组成的宏观计划。他还发展了与政策手段的联系更为明确的大型联立方程组。这些发展模型源于他对经济周期研究中



的经济计量模型方法论。

丁伯根建议,发达国家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发达国家应将目标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这将使这些国家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最大化。他强调,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工商界及公众了解发展的潜力和优势,应该提供充足的基础投资并采取措施推动与鼓励私人投资。丁伯根认为,政府应该尊重人们的偏好,但是,他又主张,如果公众观点在某些方面缺乏远见,政府就无须考虑这些意见。

丁伯根对大范围研究方法的赞同可以在他的著作《国际秩序的重构》中找到证明,这是一篇提供给他与之合作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它汲取了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精华。报告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国际秩序,来满足当前与未来的迫切需要,其目标是要铲除当前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不公平病症。

作者还主张:创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就是承认社会有责任保证个人与集体需要的满足和建立某些国际、国内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机会及获得这些机会的手段的分配要比现在更为公平。他提出的三个最紧迫的问题是军备竞赛、人口控制和食物供给。丁伯根对人类福利的深切关注以及他对经济状况研究的综合观点集中体现在这里。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不同,丁伯根一贯摒弃那些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经济问题的狭窄概念。

四、收入分配理论

丁伯根对于个人及社会经济福利的深切关注一直支配着他的学术兴趣。丁伯根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要减少西方国家中不平等现象的目标,并将此作为可被普遍接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目标。但是,他对不平等决定因素分析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经济公平哲学的关注。他将平等定义为:全社会的人得到相等的福利,在这里,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和受教育。丁伯根还指出,在教育实际状况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应该减少到最小。

丁伯根关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是建立在供给与需求理论基础之上

的。他对生产要素的价格方程进行了估计,并对与这些要素价格相应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考察。由于把劳动看做是异质的,因而,他对劳动力的供给分析是以个人效用函数为依据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以决定工作的性质和要求的生产函数为基础。丁伯根一个主要的定理是,不平等不能靠生产能力分布的不平等来解释,而只能用特殊类型生产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来解释。正是过度供给,而不是某种特殊劳动技能的绝对缺乏,导致了低工资收入。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要使教育超过技术的发展,以减少缺乏当时生产所要求技能的劳动力。丁伯根还主张,有意识地造成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借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

丁伯根关于收入分配的分析基于完整但又简单的经济模型。他强调经济变量的相互依赖性,并批评了其他研究收入分配的方法。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太注重于供给而忽视了需求。他还批评了一些早期经济研究中的随机分析方法,这种研究只是用数学公式表示个人的收入分配。丁伯根认为,由于它没有经济解释,因此,也就没有政策含义。丁伯根没有把不平等归结为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按照供给与需求对许多非经济因素加以分类。供给取决于个人的个性、能力特征,例如智商与教育水平和一些非认知特征等,所有这些全用数学来表达。他认为,定量化是使收入分配科学化、非情绪化的基本步骤。

为表达其数学模型,丁伯根试图对效用加以定量化,确定了其函数形式。根据他的展望,对公平分配的定义和研究公平分配的未来进展,依赖于经济学家对个人偏好函数数量上识别能力的加强,从而可在个人之间进行效用比较。从实用出发,他主张假设效用具有可测量性,以使经济学家对平等和分配公平的概念给出实质的内容,并有助于获得一些政策结论。

除了技术分析,丁伯根还对缩小收入不平等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政策建议。除了极力倡导优先发展教育外,他还促进了对平等概念与福利测量进一步发展的不同方向的研究。丁伯根理想的税收体制,是依据个人能力而不是依据结果来收税。在按能力征税所要求的、适用的测量技术得到发展之前,丁伯根仍然赞成对资本盈余与遗产征收高额



税收的做法。

五、福利经济学理论

纵观丁伯根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他一直保持着对福利经济学的兴趣。这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它详尽地阐述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丁伯根认为,一种成功的福利经济学应该对现实政治观念产生具体的影响,但是,这一目标以前未被人们所认识。丁伯根曾试图对似乎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定义。他的福利经济学的一般概念,是建立在他对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之上的。在探寻最优福利体制的过程中,丁伯根将自己的意见和实用福利经济学与实际问题的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结论。他认为,所有经济体制都具有使正常的心理满足达到最大化的相同基本目标。对最优福利体制的探索,实际上也就是对一系列能够为行为方程所说明并可以创造最优福利条件的有关制度的探索。

丁伯根曾批评过市场经济和指令性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结构上的二分法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两种极端的体制之间存在着许多种略有差异的体制,而且他的理想体制正存在于这种混合经济的范围之内。他把实现这种理想体制的现实途径想象为这样一种情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正在“趋同”——双方折中、妥协,变得日益相似。他相信,从道义上说,任何一个体制不优于其他体制,体制的选择依据于对效率的考虑。他把完全市场自由和国家控制概念称为两种乌托邦。他认为,它们建立在对人类自然本质的歪曲的基础之上。

丁伯根的结论是,最优体制存在于完全的自由市场化与彻底计划经济两个极端之间。他设想,将来公共权力部门的任务会日益增加,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会减少,以及通过税收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虽然他也制定了一些更集中的经济计划,但他还是反对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并认为经济刺激是经济体制的推动力量。